

目 录

潮籍鴉片烟商在上海的活动及其与蒋介石

政权的关系……………郑应时(1)

江門茶叶业历史概况……………黄国材(31)

广东三江帮的兴起、繁荣及衰落……………郭泽农(56)

雷州蒲苞业的一些史料……………陈 基(71)

0 广州古董字画苏裱业的一些内幕……………刘泽霖(80)

解放前汕头筹筑东南堤的真相……………林 天(100)

行会式的省佛港玻璃樽行工会的

罪恶活动……………叶 敬、李 辉(109)

粤剧童子班杂述……………新 珠、梁正安(131)

粤剧艺人在南洋及美洲

的情况……………新 珠、叶弗弱、庞顺尧、新雪梅(146)

粤剧艺人在海外的生活及活动……………刘国兴(172)

补充訂正

关于清末民初至抗战前广州报业两篇史料

的补充訂正……………邓警亚(189)

关于《从清末到抗战前的广州报业》一文

的补充訂正三则……………高承元、梁国光、周 哲(193)

对《广东文史资料》第18輯一些史料的

补充訂正……………蔡世英(196)

关于《孙中山移駐永丰舰的經過及永丰舰

以后的活动》一些补訂……………黎照寰(197)

对《唐紹仪生平的概述》一文的质疑……………潘 敬(199)

对《我所知道的张鳴岐与周善培在广东的

某些活动》的补充訂正……………邓誉亚、阎宗骅(200)

对《广州培正中学怎样为美帝国主义文化

侵略服务》一文的补正……………沈子愚(202)

对《海南島文昌县反袁斗争》一文的

补充訂正……………张运荣(204)

关于《潮汕铁路兴废始末》的补充訂正……………张东涪(206)

正誤表

潮籍鴉片烟商在上海的活動 及其與蔣介石政權的關係

鄭應時

鴉片戰爭之後，上海成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公開推銷鴉片的主要基地；住在上海的廣東潮州籍鴉片商人，則成為帝國主義在上海推銷鴉片的主要掮客。很多人由此發財致富，成為上海灘的富商巨賈，直至蔣介石統治時期，才逐漸為江浙人所代替，轉而經營銀業或其他工商業。但潮州巨商與鴉片烟的關係，仍繼續存在，所以上海人多稱潮州人為“黑佬”，足見鴉片與潮籍滬商關係之深。筆者先入於清末民初，曾在上海著名的鴉片交易所（即所謂“洋藥公所”，內容詳後）活動，筆者亦於民國初年到達上海，自幼目擊耳聞，對鴉片烟在上海（及其後的某些地區）的情況，頗知一二，茲寫出來以供參考。錯漏之處，尚望知者盡量補充訂正。

一 各帝國主義在上海推銷鴉片及其互相競爭

帝國主義向中國推銷鴉片，早在鴉片戰爭之前。英國、美國，都是最初的販毒魁首，而上海作為帝國主義的販毒基地，則在鴉片戰爭之後。據先人們口頭相傳，上海一被辟為商埠，英國商人隨着他們的戰艦，首先在外灘登陸，他們一登陸，就臨時設立堆棧，掛起招牌，向中國人推銷舶來品（時間

当在1843—1845年間)。其中，最早和最大宗的舶来品，就是鴉片。其始作俑者，就是“怡和洋行”。“怡和洋行”垄断上海的鴉片买卖，前后达三十年，推銷范围，及于长江流域各地区。最初替他們从事推銷工作的，主要是上海的潮州商人。这些鴉片多来自东印度公司，推銷总量，約达一百万箱（每箱一千两），其后“沙遜洋行”（时间在1870年以后），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推銷鴉片的主要陣地。我到上海的时候，“沙遜”，“哈同”两洋行还繼續进行鴉片买卖，惟“沙遜洋行”已由老沙遜传给小沙遜，不久且改为“沙遜有限公司”，扩大經營地产、軍火及其他业务。“哈同洋行”的老板哈同，原是“沙遜洋行”的管仓，因而熟悉了整个鴉片买卖的来龙去脉，在小沙遜时代，才慢慢另起炉灶，独立經營，以更老練的手法，独特的心計，一跃而起，进而与“沙遜洋行”并駕齐驅。

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推銷鴉片，初期是千方百計，利用和收买地方有勢力的集团或人士，为他們作掮客。私梟，黑社会的头目，也是他們利用和收买的主要对象。上海潮籍商人，借此机会，乘时兴起，逐漸形成强大的鴉片推銷集团。后来，鴉片推銷的局面迅速打开，鴉片买卖正常下来，就由上述英国洋行，公开挂牌定价，由各鴉片商人开设的“土行”，“土店”，按牌价訂购承銷。再由这些行、店轉售或运銷浙江、江苏、安徽等省。

其后，英帝国主义对这种經營方法，仍不滿足，复在英租界仁記路設立“洋藥公所”（成立于1885年以后）所謂“洋藥”即鴉片，所謂“公所”，实际是交易所。交易办法是由“沙遜、哈同”两洋行在公所里挂牌定价，出售期貨，各土行要购买鴉片，得先交定金（按訂貨多少計算），訂明几个月后交

貨。这样，兩洋行不但可收定金周轉运用，各土行如急需現貨，他們还可以臨時抬价，攫取加倍利潤。同时，由于交易所的成立，各土行及投机商人，又多藉机进行炒买炒卖。

“怡和”、“沙遜”、“哈同”等洋行所买卖的，都是印度鴉片，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名“大土”，潮州人称为“公班”，体积較大，每顆重三磅，用烟叶包裹，黃黑色，状似足球，但較軟，质量上乘，是帝国主义及鴉片商人为了迎合清朝的貴族、官僚等需要，特別制造的“貢品”，“公班”是潮州人的訛音，价钱最貴，以民国初年而論，最高价每兩达光洋三元至四元，一般亦在二元左右；另一种称为“小土”，潮州人叫它为“加尔加答”体积較小，每块重一磅，不加包扎，色黃黑，比“大土”坚硬，质量也較次，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得名。“加尔加答”也是潮州人的訛音。价钱最高时每兩二元，一般是一元左右（“公班”及“加尔加答”的名称，虽是潮州人的訛音，但由于經售者多是潮州人，这种訛音也就变成上海及附近地区的特定名称）。

英帝国主义是初期鴉片烟的垄断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上海所有鴉片烟的經營，全部集中于英租界內。其中，又以仁記路，广东路，棋盘街等为中心。除上述英国洋行及“洋药公所”之外，还有以批发为主的“土行”，以經營熟膏零售为主的“土店”約数十家。以售吸为主的“烟館”，为数更多，散处于各条馬路，多数与妓館，賭场混在一起。所有这些土行、土店、烟館，門口不但挂有招牌，而且还有租界当局派来的印籍巡捕站崗保护，是公开合法的經營。

英帝国主义在“怡和洋行”之后，通过“沙遜”“哈同”兩洋行，到底运进上海多少鴉片，各方面的数字还不一致。但有一个很具体的資料，可供参考。即上面說过的“洋药公所”成

立之初，“沙遜”“哈同”等洋行，曾与潮籍鴉片商人共同訂定，凡在“洋藥公所”成交鴉片一大箱（即一千两），即由两行給予回佣白銀二两。后来，两行一直沒有履行这一合約，直至“洋藥公所”結束，潮州鴉片烟商，根据合約，对两行提出控訴，結果取得胜利，沙遜、哈同被迫交出回佣白銀八十万两（潮州人后来用这笔錢举办一間貧儿教养院，即变相的学校）。这就是說，在“洋藥公所”成立約二十年期間（估計數），上述两洋行通过“洋藥公所”成交的鴉片烟达四十万箱，平均每年二万箱，即二千万两。其他帝国主义推銷，及不納入“洋藥公所”的交易數字，当不計算在內。

沙遜、哈同这两个冒险家，在上海以代理鴉片烟起家，成为英国有名的海外富商，沙遜并以推銷鴉片有功，被英王封为爵士，还以卖鴉片賺来的造孽錢，在上海大搞地产投机，建有巍峨矗立的“沙遜大厦”（現在南京路的和平大厦）；哈同因晚年无子，将产业轉卖给“沙遜洋行”，价值一千七百万两，并建有富丽的“哈同花园”（即爱麗园，在靜安寺路），絕大多數的潮籍商人，也分別成为巨富，这都是靠鴉片烟发家的暴发戶。

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独占鴉片市场，自然引起各帝国主义之間的竞争，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大抵在辛亥革命后不久），美、法、日帝国主义，曾打出所謂“人道主义”的假招牌，对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販卖鴉片，联合提出了抗議。他們在报刊上公开揭发，甚至装模作样地告到所謂“国际禁毒会”去。当时，因国际上通过禁烟法案，販毒表面上是违法的。上海英国租界当局，在上述围攻之下，也不得不假装門面，在英租界宣布“禁烟”。

英租界的“禁烟”只是一出滑稽剧，他們一声禁烟令下，

英租界的土行、土店、烟館，全部收起招牌，門口公开站崗保护的印籍巡捕撤除了，但实际上却是招牌收起，照旧营业，門口有便衣巡捕保护，为了掩人耳目，还由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与所有鴉片烟商秘密商定，表面上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贩毒私梟，骨子里却由鴉片烟商出錢收买流氓、无賴，不时身藏鴉片烟膏烟土（一般多是假貨或次貨），故意藏头露尾，让巡捕暗探当场“入脏并获”，解到“公廨”审讯定罪，并且“依法”判以徒刑，这些被捕的“烟犯”，都是按日領取酬金的“临时演員”，每坐牢一天，酬金五角、六角不等。至期滿释放之日，除清算酬金之外，有时还发棉衣、单衣等“奖品”，有些流氓、无賴，便以此作为职业。此外，有时还出动大批巡捕，到秘密“土行”进行突击检查，但每次出动检查，都事先“知会”，让鴉片商人作好准备，結果都毫无所获而退。上海英租界当局有时还对以上的查緝工作，大发新聞。其他帝国主义，虽知内幕，也无奈之何。

各帝国主义“抗議”的目的，原不是真要禁烟，而是制造机会，与英帝国主义者爭夺市场。所以，当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鴉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秘密形式从未間断），多少影响进口数量，鴉片市价越抬越高，日本帝国主义就紧握机会，在波斯（伊朗）运进大批波斯鴉片。这种鴉片，外表用紅紙包成长方形，在上海称为“紅土”，每块重一磅，这种鴉片毒质甚于印度鴉片，价格較低。日本商人即以此与英国爭夺鴉片市场，但上海“黑籍”中人，吸慣印度土，且认为“紅土”价錢虽低，但吸了会病血，結果“紅土”在上海銷路不佳，印度土反而乘机涨价，使囤积商发了大財。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它看見“紅土”在上海爭不过印土，就大幅度的降低价格，在印土“公班”每两上涨到三、四元的时候

管，“紅土”每两仅售三、四角，并大力向内地推销，夺取长江流域附近各省的市场，并以大连为基地，全部占领东北及一部分华北的鸦片市场，这种廉价推销的办法，的确大大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同时，也扩大对中国人的毒害范围。此后，印土就逐渐转入衰落阶段。

眼看着英、日帝国主义盘踞中国鸦片市场，法帝国主义也不甘心。于是，就利用它占有印度支那殖民地的便利，既在印度支那发展鸦片，并通过越南（当时称安南）大量贩运云南、贵州出产的鸦片。大抵从辛亥革命前后，法帝国主义即以越南为基地，首先毒化越南人民，跟着从越南转运鸦片至广州湾（现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与印土、“紅土”争夺市场，至1920年，由于潮州鸦片商人自己到伊朗（波斯）购运鸦片，与英租界发生利益上的矛盾（详情下面再说），经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的疏通，过去在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即从英租界转移到法租界，以半公开的形式，在法界的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一贯以英租界为主要基地的上海贩毒中心，就逐渐转移到法租界来了。法租界仅在这批鸦片行、店身上所勒索的特别费，每月就达十二万元大洋以上。以后，还继续发展。加上法帝国主义本身的贩运，及开烟开赌带来的法租界的空前繁荣，法帝国主义先后所夺取的利益，不下于初期的英帝国主义。

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对中国贩毒的祸首之一，但由于各种关系，一个时期在贩卖鸦片烟土方面，曾落后于英帝国主义。后来，它却想出了更毒辣的手段，终于以制造毒性更烈、获利更多的“吗啡”、“海洛英”等毒品，来夺取了一度为英、法、日所把持的鸦片烟市场。这两种毒品，由于服用方便，适合鸦片烟民的需要（特别是上层烟民的需要），一时

大行其道。美帝国主义就这样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把持，夺取了大部分的鸦片销路。

美帝国主义“吗啡”、“海洛英”制造和倾销的成功，使其他帝国主义都来竞相效尤。其中，日帝国主义更独出心裁，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以大连为制造基地，初时销行于东北，后流入上海，并推销于长江流域，抗战时更遍及沦陷地区。

二 上海潮籍鸦片商人的盛衰

潮籍商人最初怎样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已不得其详，但知最早和最大的潮州鸦片商，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及后来兴起的郭鸿泰号。郑正秋的祖父为英国人推销鸦片，正是上海辟为通商口岸以后不久的時候，亦即英帝国主义开始在上海推销鸦片的时候。他的周围经常团聚有一批江湖人物，如武馆教头等等，儼然是当时旅沪潮籍人的领袖，他大概凭着这种潜在力量，为英帝国主义看中，把推销鸦片的任务，委托给他，他亦由此发财致富，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烟商，不少潮籍商人，借着他的关系，投身于鸦片业，逐渐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郑洽记就是其中最强大的柱石，以后父传子，子传孙，直至蒋介石垄断全国鸦片买卖，潮州鸦片集团无形消失之前，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鸿泰的老板是郭子彬，最初在上海当厨房工人，他投身鸦片买卖成为暴富的详细过程，已不得而知。郭鸿泰土店自开张时起，即由郭子彬亲自坐柜，由于经营有术，逐渐在顾客中树立信用，生意颇好。又因他柜台照例蹲着一只白猫，顾客们就以白猫为记。后来它的业务蒸蒸日上，成为与

郑洽記齐名的沪上鴉片巨商。

郑、郭两家之外，尚有郑永康、郑宝成、李裕康、郑宝泰、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家，都是当时著名的潮籍的鴉片大戶。在上海杜月笙等未起家之前，垄断着整个上海鴉片市场。他們直接从英国的怡和、沙逊、哈同等洋行（后来是通过“洋药公所”），购来鴉片烟土，一方面煮成熟膏，或批发，或零售，从英租界轉运到华界、浦东等地区銷售；一方面勾結各地把原土运銷于长江流域或附近各省。其中郑洽記、郭鴻泰两家，所占比例最多，在上海信用也最好。整个上海、浦东、苏州、杭州，所謂上层社会的黑籍烟民，多是他們的主顾，多数“大公馆”所需要的烟膏，多由他們包煮包送，从外地来的顾客，有时还要排队购买。他們的定价，也照例比別家高些。其他各家，也各有主顾，除上海市及附近地区之外，又各有范围，各有綫路，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綫，郑永康专走鎮江綫等。江、浙、皖等省重要市鎮，如苏州、鎮江、嘉兴、安庆等等，多建有潮州会馆，可以說，所有建有潮州会馆的市鎮，都是潮州鴉片烟帮势力到达的地区。各地潮州会馆都成了鴉片商人的旅舍、分店的代名詞。

上述各家大戶之外，属于中小戶的鴉片烟商为数更多。但不論店戶大小，东主大都是潮州人，其中又以郑、郭、陈三姓最多。

潮籍鴉片烟商雄霸上海鴉片市场，算起来至少有六十年以上的历史，除郑洽記、郭鴻泰两家，都因此成为沪上百万富翁外，其他大戶，亦多积資数十万之鉅，至中小富戶，就为数更多了。即一般潮籍中人，凡与鴉片烟商有关的，也多成小康之家。所以，上海潮籍鴉片商人，就一变成为上海势力雄厚的財团之一。

潮州鴉片烟商与英帝国主义互相勾結的关系，維持了很長時間，直至英租界被迫下令“禁烟”以后，潮籍鴉片烟商人預感到前景不佳，才相继兼营或轉营別业。如郑洽記之孙郑正秋开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就是一例。而更多的潮籍鴉片烟商，則兼营或轉营錢庄、当鋪、以高利貸攫取暴利。但搞錢庄要靠江浙人当掌柜，其中，就有些人被这些江浙掌柜愚弄、欺騙（如預設圈套、放債被騙被撻等等），亏损者有之，破产者有之；至搞当鋪則要靠安徽人当“朝奉”（看貨定价的人），其中，也有些被“朝奉”欺騙（如預設圈套，大量押入贗品等），造成亏损的。因而部分資金，轉入江浙人的手里。但也有不少人轉入一般工业，如郑族中的鴉片烟商，集資開設了鴻裕紗厂和鴻章織染厂，郭、陈两姓的鴉片烟商，集資開設伟通紗厂。其余，屈臣氏汽水厂、五洲葯房、中华照相館等，也都是潮籍鴉片烟商轉业开办的。

三 潮州鴉片商人自运鴉片

潮州鴉片商人，从来是帝国主义推銷鴉片的买办、掮客。但在上海英界实行假禁烟，日本和法国起而竞争的时侯，一方面是东印度公司的进貨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是日本运入的“紅土”引起潮州商人的眼紅，潮州鴉片烟帮中，于是开始酝酿自行直接向波斯运入烟土，不經外商轉手。

在潮籍鴉片烟商开始自运鴉片之前，还有一个插曲：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譯范回春，一向与潮州烟商在法界爱多亚路開設“胜洋洋行”，名义上是代理法国影片，实际是秘密鴉片烟庄，为法国推銷云土，烟膏。他們看見“紅土”銷路好，賺錢多，就千方百計找到一个日本鴉片商人，經過多方接洽，簽訂了合同，由日商

代购二百箱“紅土”。但由于买卖鴉片不能写在合約上，就用“发电机”作为“紅土”的代号。而且先交六成定款。到期日人果然交貨，但交来的却是一具名副其实的旧发电机。潮州人虽然聘請律師，提起控訴。又因日本享有治外法权，官司只能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日本法官自然帮日本人，結果潮州人不但敗訴了，而且还要补足四成未交貨款，胜洋洋行也就因此倒閉。

胜洋洋行的被騙，教訓了潮州鴉片烟商，使他們不敢与日人交易，并决心自己到波斯去运鴉片。約在1920年，适值潮州人郑宜宾（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从欧洲到上海，途經波斯时，順便私运回两箱波斯“紅土”，这样一来，自运鴉片的道路打开了。于是上海潮籍鴉片烟商与郑宜宾合作，数天工夫，筹集現款一百万元，組成“信远公司”，公推郑宜宾为經理，并由他亲自到波斯采购“紅土”。

郑宜宾是一个长袖善舞、机警老练的家伙，通过他，向挪威买了一艘二千吨的旧輪船，定名“亚琛”号，一面修理，一方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准备运回鴉片，直接在英界趸存发卖。此外，还制备了好几个国家的旗帜，預定船到什么地方，遇到那国船只，就悬挂什么样的旗帜。

郑宜宾在波斯购买了一船“紅土”（約五百箱），很快就开到上海。可是，就在“亚琛”号返回上海途中，上海英租界当局突然通知潮州鴉片烟商，說英、美、日三国已共同通过在上海租界禁烟法令，“紅土”不能运进租界。这样一来，“亚琛”号在上海沒有靠山，自然就不能进入上海。“信远公司”的老板們极为着急。郑宜宾在海上接到电報，也不知如何是好。时适曹錕、吳佩孚控制了北方政权，原来护法南下的“渤海舰队”，为吳佩孚所收买，由海軍司令溫树德率領投吳，从海

头开回青島。“信远公司”的股東們，通过山东政客刘大闢（他在汕头設化仙別墅，結識不少潮籍人士）的关系，买通了溫树德，“亚琛”号遂开赴青島，在溫树德的保护下暂时避风，伺机把鴉片运回上海。

英、美、日三国通过禁烟法令，法国沒有参加，鴉片烟商們就通过杜月笙，向上海法租界疏通，但因遇到法国上海領事館华人翻譯王茂亭的阻挠和破坏（王与杜有私怨），一时未能成功，而“渤海舰队”内部又因分赃不均，引起内訌，溫树德要“亚琛”号馬上駛离青島。最后，还是由“信远公司”付出重資，买通当时駐在淞沪的浙軍第四师陈乐山部，临时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并把全部鴉片寄存存在龙华該师的炮兵团团部内。但不久，浙江軍閥卢永祥与江苏軍閥齐燮元，因爭夺地盘权利（其中包括包庇鴉片烟的利益），实行火并，“信远公司”无可奈何，花了很大一笔錢，再次借助于杜月笙的上下疏通，才在战火危急中得到法租界的同意，把全部“紅土”由龙华运进法租界。跟着，法租界为了挽救当时商场不景的危机，乃放下假面具，指定宝裕里、升平里的里弄，准許鴉片商人設立土行、土店，半公开地販賣鴉片。过去云集于英租界的潮籍鴉片烟商，也紛紛轉移到法租界，轉眼之間，開設了規模較大的“土行”十二家，中小的“土店”四十家，而規模較小的“烟館”，則多到难以計算。这就是鴉片烟商由英租界轉移法租界的过程。

“信远公司”第一批“紅土”虽然經過很多波折，才运回上海，但結果仍获利頗鉅。馬上引起其他鴉片商人眼紅。法租界更以种种名义，如“社会公益”、“救济筹款”等等，进行勒索。公司請杜月笙帮忙疏通，但杜也另有企图，不置可否。不久，复有法租界十二“土行”自行集資到波斯尼亚运“紅土”的

倡議。这样一来，就使郑宜宾对法租界和杜月笙深表不满，与杜月笙发生嫌隙。所以，当“亚琛”号第二批“紅土”将运到上海的时候，杜月笙突然拒不負責，而且与法租界当局勾結，不准“亚琛”号把鴉片运进法租界。但郑宜宾也不示弱，他一方面运用公司的财力，一方面运用手腕，居然又买通了当时引軍南下，首进淞沪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刘大同的同乡，經刘介紹讲妥条件），替他覓存、保护。当时的奉軍张宗昌部，正是著名的鴉片軍隊，各个部队南下时，都帶有大批“边土”（热河等地出产的鴉片），也正設法找寻銷路。所以一經接洽，馬上达成協議：程国瑞負責保护“亚琛”号进入吳淞口，全部“紅土”存放吳淞砲台；郑宜宾負責在上海为程推銷“边土”。这样一来，法租界和杜月笙不但少了一笔收入，而且“边土”藉軍隊势力在上海华界大量推广，使杜月笙的利益大受影响。

当程国瑞，郑宜宾的买卖正在順利进行时，张宗昌部駐南京的第二旅旅长毕庶澄，因自己帶來的“边土”在南京无法推銷，要求程国瑞代謀出路。而程則視上海为自己的禁嚮，予以拒絕。毕老羞成怒，竟以程包庇“紅土”受賄，进而要求平分利益。程置之不理，于是毕庶澄便引兵南下，程亦不甘示弱，严陣以待，弄成僵局。后来，經上海仕商多方調解，兩方派出代表，在南市福建会馆协商，但協議未成，复在会上开枪火并，毕方的一名軍需被打死，程方的一名參謀在楼上被推墜楼下，重伤致死。后来，还是张宗昌亲來調解，才把事情平息下去，而法租界当局，就趁釐程、毕火并的机会，請杜月笙出面与郑宜宾及“信远公司”股东轉圜，按照过去办法，准“信远公司”的“紅土”运入法租界，照常营业。杜月笙也与郑宜宾言归于好（因法租界及杜月笙都害怕郑宜宾与駐軍繼續合作，使大部販毒利益，为駐軍夺去）。当时，适程国

端旅調离上海，郑宜宾也就乐得把“紅土”运进了法租界。

经过这一番波折和較量，法租界当局对“信远公司”及郑宜宾反而另眼相看，关系較前“和洽”起来。于是郑宜宾就更加大胆放手去干，連續在波斯运回多批“紅土”，“信远公司”“生意兴隆”。法租界也在放手开烟之余，进一步划地开赌。潮州鴉片烟商就由替英帝国主义推銷鴉片，轉入自运自銷阶段。

“信远公司”的发展，进一步引起了許多烟商眼紅，部分土行、土商，紛紛組合，直接向波斯购貨；各个旧有的、新开的鴉片大戶，由于資金沒有出路，多抱薄利多銷态度，互相贬价竞争；部分江浙財閥，也通过杜月笙的关系，插手鴉片市场的投資和爭奪。这时大多数潮州烟商，既害怕利权“外溢”，又感到互相竞争，終非长策。于是，就有人以同乡同业关系，奔走聯絡。結果，經過会商就一致同意解散“信远公司”，另外成立一个包括各个鴉片烟局的“公平公司”。

“公平公司”資金共一千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及各間鴉片行店，仍以郑宜宾为經理，由全体股东組成董事會，監督公司业务，可說是当时上海鴉片商人的总汇。自公司成立之后，所有土行、土店鴉片存貨，統交公司經售，不得自銷。每天，由公司开盘挂牌，統一鴉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銷发卖。同时，通过疏通賄賂，取得帝国主义及各地官僚軍閥的支持，还办理鴉片包运包送业务。其規模之大，影响之巨，在上海是空前的，儼然是当时上海的鴉片“托辣斯”。郑宜宾掌握着这个公司，还计划在經營取得成就，資金更为雄厚的时候，就轉而投資銀行，工厂等，过渡为外国式的垄断財团。可是，“公平公司”成立后第一批从波斯运回来的“紅土”，竟不能“过籠”（不能煮成熟膏），无法銷售，使全体股东，大为震惊。郑宜宾虽几次派人到波斯交涉，并进行

調查研究，但都不得要領，結果只得賤價賣給日本人提煉制成“紅丸”，“公平公司”也因此破產倒閉。潮州烟商，特別是一些小本商人，很多因此傾家蕩產。鄭宜賓在一氣之余，不久就病死了。上海潮籍烟商壟斷鴉片的企圖，也就從此破滅。

“公平公司”的倒閉，标志着潮州籍鴉片商人在上海的衰落。此后，雖仍有個別經營，但由於大批川土、云土、黔土、邊土，在官僚、軍閥與帝國主義的勾結推銷下，占領了各地鴉片市場。再過不久，蔣介石成立“禁烟督察處”，全面壟斷鴉片買賣，潮州鴉片烟商的經營、活動，就進入尾聲。

四 反動政府和鴉片運銷

鴉片烟最初在中國傾銷，帝國主義自是禍首罪魁，但清末以來各個反動政府、及各地官僚軍閥對它們的勾結助虐，也是罪無可逭的。

在辛亥革命以後不久，英帝國主義還沒在上海租界“禁烟”，袁世凱曾對英國利用租界推銷鴉片提出“抗議”，要求英國在上海“禁烟”。英帝國主義知道這只是敲詐、分肥。它一面回答袁世凱政府說：在上海英租界販賣鴉片的都是中國商人，只要中國人不販賣鴉片，就誰也無法推銷鴉片，所以販賣鴉片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英國無關；一面叫上海的潮籍鴉片商人，向北京政府請願。於是，潮州烟商就由鄭子加等人，組成代表團，由當時的“洋藥公所”撥給活動費用，前往北京，謁見當時的財政總長梁士詒，提出緩禁鴉片的請求。理由是潮州商在上海世代經營鴉片，一旦禁烟，不但現已購下的存貨無法銷售，使潮州商人陷於破產，同時潮州商人今後也毫無生計，將臨絕境，務請照顧商人實情，暫緩實行禁烟。梁士詒當時答复說：“現在的政府是革命的政府，鴉片一定要禁絕。

上海潮州烟商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行轉业。如果商人一时找不到轉业門径，政府可以把‘淮盐’的經營，让給潮州商人。”其实骨子里是要錢。潮州烟商代表后来送給梁士詒一笔很大的錢（數目記不清了，由“洋药公所”負担），梁士詒就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名义上还保持了禁烟的招牌，只是为了照顧商人，准許所有上海已购下的鴉片存貨，全部補貼政府“印花”（每兩“印花”費貳角），仍可公开銷售。实际上是規定所有在上海銷售的鴉片，都必須向袁世凱政府繳納“印花費”每兩貳角。只要貼足“印花”，即可合法在內地运銷，數量并不限于“存貨”。此种印花稅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反动政府的一种稅收。鴉片买卖，在国内也就成为公开合法的經營。

除了上述的“印花”稅以外，鴉片从上海运銷江浙、安徽等地，要取得当地官僚軍閥的合作与支持，就必须繳納保护費、附加費或特費、特稅等。这是当时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連結成一体，共同毒化中国的一面。

另一面，帝国主义也运用自己的商船、战艦，为后期的軍閥官僚推銷鴉片服务。原来，帝国主义一向就利用“內河航行”特权，起初是替商人向內地运送鴉片，等到清末民初，四川、云南、貴州、热河、甘肃、新疆等地的軍閥官僚，大举种植、出产鴉片，逐渐代替外土，行銷于全国各地。帝国主义又反过来，利用他們的船艦与特权，为軍閥官僚从內地向沿海运銷鴉片。当时，云土主要由法帝国主义經越南运香港、上海；边土多由日本轉运华北、东北；川土及部分黔土，多集中重庆沿长江东运。最常見的运输办法，是通过美、英、日三国的“太古”“怡和”“日清”“其昌”洋行和輪船公司的买办，与重庆鴉片烟商（軍閥、官僚的代理人）及輪船船主訂定密約，以特制的內艙，包运鴉片。沿途虽有关卡盘查，复